

# 高中生学历观念的性别差异之国际比较

王杰

(日本学术振兴会&东京大学)

**【摘要】**本文使用在日本关东地区、香港和上海收集到的高三学生问卷调查数据，比较不同地区高中生自我学历期待、学历价值认同的性别差异，以及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

主要结论如下：描述性分析显示，日本和香港学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上海男女生之间的自我学历期待没有显著差异；香港和上海样本在高学历价值取向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日本样本在这一点上性别差异不明显；性别对日本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男生更期待获取高学历；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和日本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社会阶层也倾向于期望男生获取高学历；性别对香港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没有显著影响，媒介于社会阶层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上海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表面上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控制了社会阶层变量后，性别变为影响显著，女生更期待获取高学历；上海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最强，社会阶层倾向于期望男生获取高学历。

**【关键词】**高中生；学历期待；学历价值认同；性别差异；社会阶层

## 一、引言

东亚地区和国家拥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近些年来，教育公平理念已成为该地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目标。但该地区同时拥有“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女性不曾有资格参加任何朝代的人才选拔。近代以后，女性逐步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资格参加各类升学考试，获取学历，在人才市场中经历“选择”与“被选择”，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力资源，女性接受教育的意识、对学历的认同与追求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东亚各国的状况又不尽相同。

## 二、社会文化背景和有关学历观念性别差异的先行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妇女解放和教育机会问题。1975年召开的第一次妇女大会明确提出妇女有平等享受各级教育、职业训练和就业机会的权利。此后，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各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很多欧美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大学升学率已经超过男性（杨东平 2006）。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女性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追求高学历，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出现该现象，一些地区的女孩子甚至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呢？文化因素、政策因素、劳动市场因素等宏观环境的影响非常重要。吴愈晓（2012）认为父权制文化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作用机制体现在“直接的性别歧视”、“强烈的生育愿望”和“对女孩教育热望的影响”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可以具体阐释为：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社会文化意识潜移默化中影响女性自身的价值追求、教育观念以及学历观念。

在当今日本社会中，父权制文化对“生育愿望”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存在“直接的歧视”和“对女孩教育热望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格局相对明确，女性承担着家庭中的大量无偿劳动，并成为用人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女性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曾多年停滞在短期大学。基于如此社会背景，日本有不少文献关注女性的学历观念，其中包括女中学生的升学意愿，以及影响女生升学意愿的家庭因素、成绩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中西（1998）使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集到的女高中生、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具体分析了年轻女性的学历期待、人生选择等。根据她的分析，升学选择中存在“非能力主义”的分流，即学业成绩处于同等水平的学生其升学意愿有可能大不相同，性别角色观念和对未来人生期待的差异可能导致学生做出不同的选择；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教育方针往往与学生的升学、就业意向倾向于一致；女生的升学选择还容易受到母亲教育水平及职业状况的影响。尾嶋（2002）的研究则显示，社会阶层对高中女生自我学历期待的影响在削弱，高中类型的影响在加大，女生也开始倾向于凭成绩考取重点高中，进而考入四年制大学，升学意识趋于男性化。

香港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复杂，女性的就业比例虽不及中国大陆，但经济发展水平高，整体受教育水平也较高。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劳动参与率越高。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香港中心公布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香港十五岁学生的学历期待影响显著（HKPISA 通讯第 15 期、2013），但该中心没有公布中学生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公布的分析结果显示，香港中学生在是否要读完大学和获得上二等学位（upper second degree）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OECD 2015）。

上世纪，中国大陆女性的文盲、半文盲比例一直较高，女童失学曾是多年困扰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女生就读普通高中的比例和大学升学率一直低于男生。但是，相关研究和宏观数据表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一直在缩小，世纪交替前后，女生的普通高中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了男生。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男女平等意识的提高、各教育层次的持续性教育机会扩张、以及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吴 2012）。但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关注的是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近几年开始关注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李春玲 2009），聚焦年轻一代学历观念的性别差异研究尚凤毛麟角。陆根书等人（2009）的高中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需求的性别差异已不大，“我国家庭存在的‘男孩偏好’倾向、家庭教育期望的代际传递模式、家庭资源的不充裕等因素是造成高等教育需求中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上海，笔者尚未找到有关高中毕业生学历观念性别差异的研究文献。

### 三、实施问卷调查的城市及使用样本界定

本文使用科研项目“从青少年期向成年人过度的纵向研究”（简称 JELS）<sup>1</sup>在日本关

---

<sup>1</sup>该项目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基础研究（B）的经费资助，科研代表为御茶水女子大学耳塚宽明教授。数

东地区东京附近的 A 市、香港和上海三个样本区收集到的部分高三在校生问卷调查数据。三个样本区在国际化程度高，经济相对发达，高等教育入学率较高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其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见表 1。

表1 样本区基本情况

| 抽样地区     | 调查时间    | 高中升学率               | 高等教育入学率 |
|----------|---------|---------------------|---------|
| 日本关东地区A市 | 2009年秋季 | 98%以上（其中2至3成就读职业高中） | 超过80%   |
| 香港两区     | 2010年春季 | 100%（一贯制普通中学）       | 超过60%   |
| 上海A区     | 2011年冬季 | 96%以上（大约一半就读职业高中）   | 接近70%   |

注：表中基本使用2010年的数字。

2009年秋季，日本关东地区东京附近 A 市 9 所公立高中的高三学生参加了 JELS 的问卷调查，1964 名学生回答了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2.6%。2010 年春季，JELS 在位于香港特区中心地段的 A 区和位于郊区农村的 C 区实施了问卷调查。确定样本区后，随机抽取了样本校，并进一步在每所样本校抽取了两个班级，A 区 5 所中学的 323 名中六、中七学生<sup>2</sup>和 C 区 8 所中学的 448 名中六、中七学生回答了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3.6%<sup>2</sup>。2011 年冬季，JELS 在上海市 A 区实施了类似的问卷调查。我们在该区的市区、郊区分别抽取了样本校，并进一步抽取了样本班级，共有 6 所高中的 1280 名高三学生回答了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5%。

由于香港的样本已经经历了一次预科选拔，优秀学生比例高，为了提高比较分析的严密性，笔者在进行三地比较之前做了如下尝试：1) 从日本和上海样本中剔除职业高中学生后与香港做比较；2) 进一步从日本和上海样本中剔除升学率不高的普通高中，留下升学率较高学校(重点高中)的样本与香港做比较。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日本、上海的重点高中样本与香港样本的可比性最大。因此，本文的统计结果与分析部分将不使用在日本和上海的普通高中以及非重点普通高中收集到的数据，把使用样本界定为日本关东地区 A 市 2 所“升学高中”的 555 名学生、香港 13 所中学的 771 名学生、以及上海 3 所重点高中的 913 名学生(表 2)。

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科喜好、学习成绩、学校生活、校外学习时间、家庭环境、毕业指导、自我学历期待和家长对自己的学历期望、自我职业期待、教育费分担意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价值取向以及家庭成员构成等。

据使用征得了课题组成员的同意。

<sup>2</sup>香港两个年级的学生接受的是旧学制教育，相当于其他两地的高三毕业生。

表2 样本回收情况及样本使用界定

| 抽样地区     | 样本校数 | 有效回收数 | 有效回收率 | 使用样本界定   |
|----------|------|-------|-------|----------|
| 日本关东地区A市 | 9    | 1964  | 92.6% | 555 (2)  |
| 香港两区     | 13   | 771   | 93.6% | 771 (13) |
| 上海A区     | 6    | 1280  | 88.5% | 913 (3)  |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样本校数。

#### 四、统计结果与分析

三个样本区的高中生未回答或没有清楚回答自我学历期待的比例均小于 10%，笔者在统计分析时将这些样本视为缺失值。进行性别差异分析时，未回答性别的样本也将被剔除<sup>3</sup>。使用变量的具体设定见表 3。

表3 主要变量的设定描述

|         |   |
|---------|---|
| 自我学历期待  | 描述性分析时归纳为“高中”、“短期高等教育”、“四年制本科”和“研究生”四个范畴；重回归分析时转化为获取期待学历所需要的标准年数。 |
| 学生性别    | 描述性分析时分为“男生”、“女生”；重回归分析时设为虚拟变量，男生（1）、女生（0）。                       |
| 学业成绩水平  | 重回归分析使用学生回答的自我成绩评估。“优秀”（5）、“中等偏上”（4）、中等（3）、“中等偏下”（2）、“很差”（1）。     |
| 家庭生活水平  | 学生对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判断。“很高”（5）、“中等偏上”（4）、中等（3）、“中等偏下”（2）、“很低”（1）。         |
| 家长教育水平  | 把学生回答的母亲最终学历转换为获得该学历需要的标准年数。                                      |
| 家长的学历期望 | 学生回答的家长对自己的最高学历期望，将其转换为获得该学历需要的标准年数。                              |

##### 1. 描述性分析(1)——三地使用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状况和性别差异

如图 1 所示，日本、上海的使用样本与香港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有类似之处，即 97% 以上打算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当然，这是因为样本所在学校的层次比较高或经历了预科选拔。三地高中生所期待的学历水平又有所不同。日本样本有 72.5% 希望就读四年制本科院校，而香港的这一比例是 46.4%，上海的这一比例是 58.2%。原因在于香港和上海样本期待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非常高，分别是 46.0% 和 38.7%，而日本的这一比例是 19.4%。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但希望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社会需求有限，劳动市场对研究生人才的需求增幅不大。还有，日本和香港都有接近 7% 的样本希望就读 2-3 年制的短期高等教育，而上海的这一比例仅有 0.7%，是其他两个样本区的十分之一。

<sup>3</sup>日本和香港样本的性别缺失比例非常小，上海 3 个样本校的性别缺失比例都超过 10%。这些缺失样本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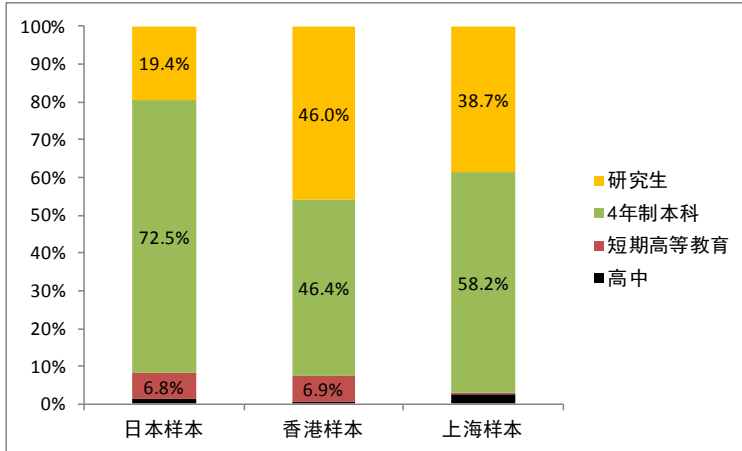


图1 三地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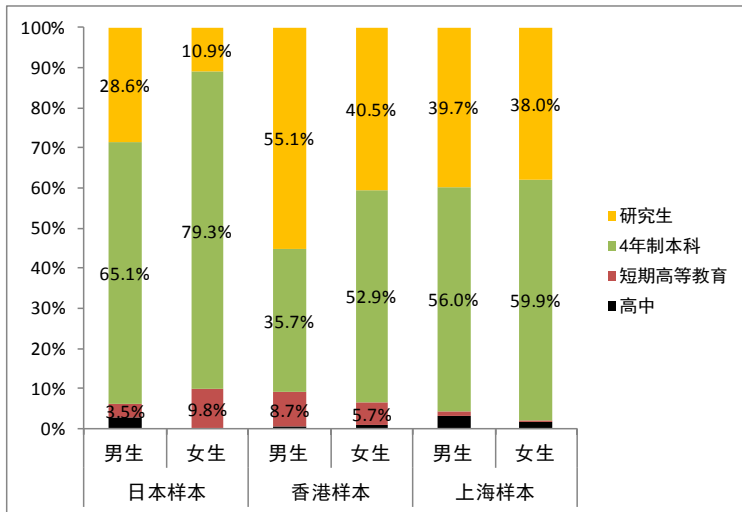


图2 三地男生和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分布

三地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比较见图 2。交叉列表的卡方检验显示，日本男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和香港男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上海男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之间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日本样本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在升学率很高的普通高中，男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男生期待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达 28.6%，而女生只有 10.9%；男生希望就读短期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 3.8%，而女生有 9.8%。香港样本的性别差异状况有所不同，男女生希望就读短期高等教育的比例差距只有 3%，希望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差距较大，男生打算获取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达 55.1%，高出女生大约 15 个百分点。较之日本和香港，上海男女生期待就读各个学历的比例都相差无几。

## 2. 描述性分析(2)——“认为对于个人的成功高学历很重要”的性别差异

我们在问卷中请学生回答了他们“认为在各自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根据样本的回答，我们归纳了样本学生认为在各自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五大重要因素。日本和香港排在五大重要因素首位的是“努力”，上海则是“人脉关系”。“认为高学历很重要”的比例在日本居第四位，在香港居第三位，在上海与“努力”并列第四位。进一步比较“男生和女生认为高学历对于获得成功很重要的比例”会发现，日本几乎没有性别差异，上海女生认为高学历很重要的比例高出男生5个百分点，香港女生把高学历视为第一重要因素的比例也比男生高出7个百分点（表4）。

表4 认为高学历对于获得社会成功很重要的男女生比例

|      |  |
|------|--|
| 日本样本 | 男生35.4%、女生35.7%  |
| 上海样本 | 男生35.4%、女生40.5%  |
| 香港样本 | 男生 高学历为第一重要因素16.8%、高学历为第二重要因素29.5%、高学历为第三重要因素6.0%<br>女生 高学历为第一重要因素24.1%、高学历为第二重要因素31.6%、高学历为第三重要因素6.6% |

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获取大学以上文凭的比例已经超过男性。一个较为合理的诠释是：女性通过获取高学历来弥补性别给自身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不利。香港和上海女生认为高学历很重要的比例超过男生这一结果或许与如上诠释一致。那么，在男女差距非常大的日本社会中，男女生对高学历重要性的评价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差距呢？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女性即便获取了高学历也很难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厚生劳动省的年度数据表明，日本女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一向低于男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

## 3. 重回归分析模型的推测结果

接下来分析影响三地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主要因素，剖析多种因素错综交织下性别对高中生自我学历期待产生的影响。

表5是日本样本重回归分析模型的推测结果，因变量是把学生的自我学历期待转换为获得该学历通常需要接受的教育年数。模型1仅控制了性别和自我成绩评估，性别的P值小于.001，影响力较大，自我成绩评估的影响次之，但调整后 $R^2$ 只有.067，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够好。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母亲的教育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和家长的学历期望等社会阶层变量，调整后 $R^2$ 增大到.411，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家长学历期望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615，成为所有自变量中最有影响力的变量。性别在模型2中的影响有所减小，但其P值在统计学上仍然有意义。这表示即便是控制了社会阶层的影响，性别对日本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仍然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较之女生，男生更期待自己将来能够获得较高的学历。

表5 日本样本重回归模型 (n=430)

|                   | 模型1       |          | 模型2       |          |
|-------------------|-----------|----------|-----------|----------|
|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 (常数)              | 15.699*** |          | 6.223***  |          |
| 性别                | .473      | .233 *** | .159      | .078 *   |
| 自我成绩评估            | .102      | .131 **  | .043      | .055     |
| 母亲教育水平            |           |          | -.011     | -.020    |
| 家庭生活水平            |           |          | .018      | .014     |
| 家长的学历期望           |           |          | .614      | .615 *** |
| F值                | 16.360*** |          | 60.895*** |          |
| 调整后R <sup>2</sup> | .067      |          | .411      |          |

\*\*\*P&lt;.001 \*\*P&lt;.01 \*P&lt;.05

表6 香港样本重回归模型 (n=597)

|                   | 模型1       |         | 模型2       |          |
|-------------------|-----------|---------|-----------|----------|
|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 (常数)              | 15.214*** |         | 8.095***  |          |
| 性别                | .225      | .088 *  | .135      | .053     |
| 自我成绩评估            | .160      | .127 ** | .095      | .076 *   |
| 母亲教育水平            |           |         | .042      | .091 *   |
| 家庭生活水平            |           |         | -.071     | -.046    |
| 家长的学历期望           |           |         | .462      | .406 *** |
| F值                | 7.799***  |         | 29.807*** |          |
| 调整后R <sup>2</sup> | .022      |         | .194      |          |

\*\*\*P&lt;.001 \*\*P&lt;.01 \*P&lt;.05

香港样本的重回归分析模型见表6。在模型1中,性别的P值小于.05,自我成绩评估的P值小于.01,但调整后R<sup>2</sup>只有.022,能够解释的样本比例非常小。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三个社会阶层变量,调整后R<sup>2</sup>增大到.194,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改善。模型2显示,对香港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影响力最大的是家长的学历期望,其次是母亲的教育水平,再次是自我成绩评估,性别的P值在统计学上不再有显著性。也就是说,交叉列表和模型1显示的香港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与性别的关联在模型2中被社会阶层变量吸收掉了。在性别是否超越社会阶层对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产生影响这一点上,香港和日本的分析结果大不相同。

表7是上海样本重回归分析模型的推测结果。模型1中性别的P值大于.10,不具有显著性,自我成绩评估的P值小于.001,但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好。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三个社会阶层变量,调整后R<sup>2</sup>从.033增大到.448,拟合优度大幅改善。在模型2中,家长学历期望的影响力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643,自我成绩评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从.190减小到.102。值得注意的是,性别转为P值小于.00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29。这表示在控制了社会阶层的影响后,性别显示出较强的关联,上海女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实质上高于男生。

表7 上海样本重回归模型 (n=639)

|                   | 模型1       |          | 模型2        |           |
|-------------------|-----------|----------|------------|-----------|
|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beta$    | 标准化系数     |
| (常数)              | 16.026*** |          | 4.574***   |           |
| 性别                | -.116     | -.034    | -.436      | -.129 *** |
| 自我成绩评估            | .321      | .190 *** | .173       | .102 **   |
| 母亲教育水平            |           |          | .020       | .038      |
| 家庭生活水平            |           | ***      | .025       | .010      |
| 家长的学历期望           |           |          | .693       | .643 ***  |
| F值                | 12.064*** |          | 104.863*** |           |
| 调整后R <sup>2</sup> | .033      |          | .448       |           |

\*\*\*P&lt;.001 \*\*P&lt;.01

#### 4. 三地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程度

我们用表5、表6和表7模型1中的性别偏回归系数减去模型2中的性别偏回归系数可以得出性别影响的变化量，这个变化量可以表示三地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程度，或者说三地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程度。用(变化量/模型1性别偏回归系数\*100%)还可以计算出性别的影响程度因控制社会阶层而发生的变化率(表8)。

表8显示，香港性别偏回归系数的变化量为-.090，变化率为-40.0%，再考虑P值的变化，我们不妨如下解释：香港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有一定关联，但关联非常小。日本和上海模型中性别偏回归系数的变化较大，变化量分别为-.314和.320，变化率分别为-66.4%和275.8%。日本样本的这一关联意味着性别对样本自我学历期待影响的大约66%媒介于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影响也是期待男生获得更高的学历。上海是控制了社会阶层变量后性别的P值才有显著性的，上海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最强。具体分析发现，上海男生家长的学历期望比女生家长的学历期望更高，男生家长希望男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达43.6%，而女生家长希望女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是26.1%(省略图表)。

表8 性别偏回归系数的变化量和变化率

|     | 日本模型   | 香港模型   | 上海模型   |
|-----|--------|--------|--------|
| 变化量 | -.314  | -.090  | .320   |
| 变化率 | -66.4% | -40.0% | 275.8% |

变化量=模型2偏回归系数-模型1偏回归系数

变化率=变化量/模型1偏回归模型\*100%

## 五、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关东地区和上海市重点高中高三学生、以及香港预科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把握了三地样本自我学历期待、学历价值认同的总体状况和性别差异状况，

并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对自我学历期待产生的影响、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主要结论如下。

结论一，跟日本相比，上海和香港样本更期待获取研究生以上高学历。上海样本的学历期待集中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三地样本选择短期高等教育的比例较小，尤其是上海。对三地样本而言，接受研究生教育和短期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可能大不相同。描述性分析显示，日本和香港学生的自我学历期待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上海男女生之间的自我学历期待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二，三地样本所回答的影响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有所不同，但“高学历”是三地样本认为在各自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香港和上海样本在高学历价值取向方面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更信奉高学历的效用。但日本样本在这一点上没有性别差异。

结论三，性别对日本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较之女生，男生更期待获取高学历。而且，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别影响的大约 66%与社会阶层有关，日本的社会阶层也倾向于期望男生获取高学历。性别对香港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没有显著影响，媒介于社会阶层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上海样本的自我学历期待表面上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当我们控制了社会阶层，性别变量显示拥有显著的、较强的影响，较之男生，女生更期待获取高学历。上海样本自我学历期待的性别差异与社会阶层的关联最强，社会阶层倾向于期望男生获取高学历，与性别的影响相反。

笔者最后想强调一下，如上结果反映的是三个样本区中成绩比较优秀的高中生的学历观念及其性别差异状况，家长的学历期望对三地高中生自我学历期待的影响是巨大的，都倾向于期望男生获取较高的学历。

## 参考文献

1. 李春玲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妇女研究论丛》 2009(1)。
2. 陆根书、刘珊、钟宇平 <高等教育需求及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 2009(10)。
3. 中西祐子 《ジェンダー・トラック》 東洋館出版社 東京 1998。
4. 尾嶋史明 「社会階層と進路形成の変容—90年代の変化を考える—」 『教育社会学研究』 (70) 2002。
5. The ABC of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Aptitude, Behaviour, Confidence. PISA, OECD Publishing, 2015。
6.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32) 2012。
7. 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香港中心 《通讯》(15) 2013。
8. 杨东平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